

新时期中国的家庭与人口问题

“中国的家庭与人口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谭琳 李新建

为了更好地筹备1997年国际人口科学大会“中国的家庭规模范式”分会和促进中国家庭与人口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女性与发展研究中心于1996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联合举办了“中国的家庭与人口问题”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高校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校系统、计划生育系统及统计局等系统的4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提交了28篇学术论文。1997年国际人口科学大会国际组委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李竞能教授、天津市人口学会理事长、天津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张书统先生、南开大学教务长车铭洲教授及天津市政协常委、原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赵玉茹女士等领导应邀参加了会议并作了专题学术报告和发言。与会代表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计划生育学、教育学、人类学及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对近年来中国的家庭与人口问题及其日益紧密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讨论的内容包括家庭规模的范式、家庭户规模、家庭结构、家庭类型、家庭观念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还包括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人口和政策因素及后果。研讨会一方面,考察了宏观和微观社会、经济及人口因素对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类型等方面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分析了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变化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学后果,现将本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争论热点及所得成果综述如下:

1. 中国的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类型及其变化

1.1 对家庭规模及其范式的认识

多数与会代表对家庭规模的认识和讨论集中在家庭户规模及其变化方面,认为中国家庭户规模的变化具有阶段性和相对稳定性,但随着社会、经济、人口发展和人们的家庭观念、社会价值观的不断变化,在人口规模增大、家庭户数量增多的前提下,中国的家庭户规模在向小型化方向转变。赵秋成、徐辉、王金营等代表的研究表明,宏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对平均家庭户规模有较显著的影响。陈卫民代表认为应该重新认识人口因素在家庭户规模变化中的作用。他指出,人口因素,特别是生育率水平及其变化是影响家庭户规模的重要因素。不同时期的生育率水平对家庭户规模的影响是通过多种途径综合作用的。为了弄清生育率影响的具体途径及过程,有必要把家庭户中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变化分开来考察。家庭户中未成年人数量的变化是一定时期生育率变化的累积效果,基本不涉及家庭结构问题,而成年人的数量变化则主要反映家庭结构的变化,是生育率间接作用的结果,后者更能表现社会变迁的性质。

还有一些学者把家庭规模定义为家庭中夫妇生育的孩子数，一般地可以用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或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来表示。家庭规模的范式指一个社会中人们所普遍认同和具有的家庭规模，它不仅反映该社会中的普遍流行的家庭规模模式，而且规范着社会中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在这一定义下，代表们认为，中国的家庭规模范式非常复杂，不仅各地区具有不同的家庭规模范式，而且城乡间、不同文化程度及不同社会分层的人群间也有较大的差别。目前家庭规模范式的形成具有较强的条件性，尤其是农村地区，人口政策的作用较强。李新建、马小骝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与女性地位等因素对家庭规模范式的影响。

1.2 家庭结构类型及其变化

所谓家庭结构是指家庭中的人员构成，是组成家庭成员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家庭成员的配合与组织、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家庭模式和类型。代表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近年来中国家庭结构类型的变化以及未来趋势上。贺正时代表指出，家庭结构演变到今天，核心家庭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主要家庭结构类型，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的核心家庭呈网络状，这种网络形特点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符合中国的传统习俗，能满足人们的亲情、心理和生活需要。潘允康代表认为，家庭结构与居住状况密切相关，家庭住房是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区位距离、家庭居住模式和家庭结构的重要因素，从住房角度研究家庭结构是社会区位学在家庭问题研究中的应用。1993年在天津和上海进行的住房与家庭调查得到的结果表明，“住房面积”、“工作单位是否提供住房”和“子女是否为房本持有者”等因素与居住模式有密切的关系，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居住模式和家庭结构。他指出，随着中国的住宅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中国的城市家庭结构将会有进一步的变化。刘庚常代表把中国家庭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概括为：以核心家庭为主要形式，丁克家庭（夫妇自愿不育家庭）和单亲家庭（父母分居组成的家庭）的比重将有所上升，空巢家庭（老年人不与后代一起生活的家庭）日渐增多。同时，他强调，中国家庭结构变化趋势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即中国农村直系家庭比例高于城市，核心家庭比例低于城市。与会代表还讨论了度量有关影响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等因素的指标和研究方法等问题。

2. 与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变化相关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

2.1 养老问题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老年人口保障问题提出了挑战。随着中国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变化而显得日益突出的养老问题成为本次研讨会的焦点之一。周双超和于学军代表认为，中国家庭在老年供养体系中的作用不可能完全被社会养老所替代，一方面要承认家庭核心化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必须发挥和强化家庭的养老功能。中国家庭养老的必要性主要取决于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家庭在解决养老问题中的特殊作用：（1）从对老年人的经济供养上看，在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供养；城镇老年人的“三大经济支柱”（退休金、子女或配偶供给）中来自家庭的也占到50%左右。（2）从对老年人的精神供养上看，家庭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相对于经济供养，老年人的精神供养是较高层次上的需求，主要指老年人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藉、心理上的满足和临终前的关怀。老年人的精神供养是经济供养所不能替代的，也是无法用金钱买

到的。在精神养老方面，家庭养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蔡文媚等代表指出，随着中国城市空巢家庭的增加，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除了强调家庭对精神养老的作用外，建设和完善社区组织和服务系统，对老年人开展全方位的养老服务，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褚丽萍代表则认为，随着空巢家庭的日益增多，城市父母的养老观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天津市市区近半数的父母选择依靠老伴养老；另有 19.67% 的人选择进养老院。只有 15.29% 的人选择依靠子女养老。因此，在城市，对老年人来说，空巢家庭既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而且也越来越成为他们积极的选择。

2.2 独生子女问题

独生子女问题的产生，不仅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相关，而且与中国家庭结构类型的变化有关。因此，独生子女问题也成为本次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之一。蔡文媚和柳玉芝代表强调指出，中国城市的独生子女问题不仅对城市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产生了影响，而且关系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针对独生子女问题，灵活地调整和执行人口政策，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任文代表认为，“四二一”形式的家庭结构对孩子的教育有负面影响。所谓独生子女的特点，诸如自私、任性、胆小和优越感等，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造成的。李和平等代表则认为，目前的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有利于提高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选择和重视。关于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高峰代表从教育学的观点指出，在目前的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形势下，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教育作用很重要，家长除了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外，应特别强调对独生子女的自主、自立、自强和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同时，应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

2.3 家庭生活质量和健康问题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家庭规模的范式和家庭结构类型的变化对家庭生活质量和家庭成员的健康有一定影响。李竞能代表建议，应该多从家庭生活质量提高的角度来认识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问题。他认为，代际之间的关系对家庭生活质量有较大影响。王菊芬代表指出，家庭结构和家庭环境对子女的生理发育、性健康知识的获取、性态度的定位及性行为的发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她通过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于 1995 年 11 月～1996 年 1 月对上海市 5 个区、县所做的“未婚先孕及其结果选择”调查分析发现，母亲的文化程度和职业类别对其女儿未婚先孕的结果选择（赶紧结婚或人工流产）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张晓辉和赵瑞美代表认为，在目前城市家庭普遍生育一个孩子的形势下，城市妇女的生育健康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他们通过对天津市 276 位人工流产妇女的典型调查分析发现：由于许多妇女对人工流产会影响身心健康这一事实认识不清，因此，在避孕行为上的偏差，导致避孕失败。妇女在人工流产后，普遍存在休息时间较短、身心不适等问题。尤其是未婚妇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她们面临的问题更多、更复杂。因此，如何对未婚男女青年和已婚夫妇进行适当的生育健康知识教育，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2.4 与家庭问题相关的其它问题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讨论，本次研讨会还涉及另外一些与家庭问题相关的问题，例如，家庭关系的变化和家庭暴力问题、农村的生育控制问题、生育决策过程中的性别偏好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未来婚姻挤压问题等等。

（下转第 24 页）

“三结合”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典型。

(2) 垫江模式：这是在经济不发达、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差地区，从微观（家庭）层面入手，通过“三结合”初步改变人们的传统生育观，奔小康的典型。

(3) 名山模式：这是在丘陵地区以不发达农业经济为主的县，通过“万名妇女奔小康”活动发展商品经济，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的先进典型。

(4) 苍溪模式：这是在不同地域类型但是人口经济压力都很大的地区，通过“少生（优生）致富防老工程”，增强家庭养老基础，进而转变人们生育观念，基本消除计划生育工作障碍的典型。

(5) 南川模式：这是走社区综合发展道路实现“三结合”，引导农民奔小康，保持计划生育先进市的典型。

计划生育“三结合”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尚待进一步总结，但是它的运作，必将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人口控制打下基础。

参 考 文 献

- 林富德等，四川省人口发展前景（1995—2060）（打印稿）；贵州省人口发展趋势：预测与分析（打印稿）；陕西省人口发展前景（打印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发展前景（打印稿）等预测数据校订，1995
何承金，赵学董，罗启蒙，贫困与发展道路选择，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Coale Ansley J. 人口转变理论再思（中译本），社会人口学的视野（顾宝昌编），商务印书馆，1992
陈俊杰，农民生育观念研究：社会人口学的透视与展望，人口研究，1995，19(6)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
肖立见，我国人口控制的问题分析和对策研究，社会科学家，1992，(6)
周 弘，欧洲社会保障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89，(1)

（本文责任编辑：朱 萍）

（上接第 64 页）

3. 对本次研讨会的简要评论

本次研讨会的代表来自不同的地区（包括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及西北）、不同的专业领域（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统计学及计划生育学等），且分别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老、中、青）。会议代表的来源反映了家庭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有关家庭问题的研究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本次会议讨论的内容比较广泛，不仅包括家庭规模的范式、家庭户规模、家庭结构、家庭类型、家庭观念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而且包括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人口和政策因素及后果。尽管对有些理论问题讨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但是，本次研讨会在家庭问题和家庭与人口问题的相互联系等方面的讨论所取得的进展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中国有关家庭与人口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与人口形势的不断变化，有关家庭问题的多学科交流和研讨必将会呈现出新的局面。

（作者工作单位：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徐培英）